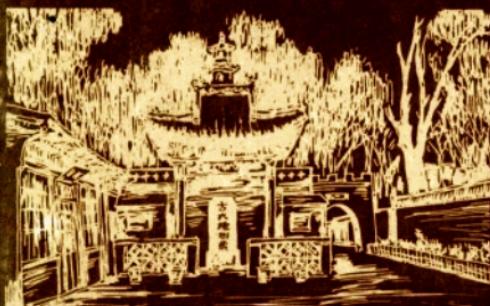


山西



前　　言

山西，表里山河，人杰地灵。古代，是华夏文化的摇篮，是北方政治、经济、军事的重心；近、现代，又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要阵地。山西人民世世代代勤劳勇敢，奋斗不息，走过了繁荣、发展、衰落的不同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又走向了新的繁荣。

爱祖国是从爱家乡开始的。为了增进人们对山西的了解和激发山西人热爱家乡，立志振兴山西的感情，我们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编著了这部《山西史》。它包括山西的古代、近代、现代、当代（截至1988年）四个部分，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阐述了山西从古到今的历史，突出了山西人民古代创造的文明，近、现代遭受的屈辱，进行的拼搏和当代从事的振兴。

该书由张玉勤担任主编，拟定编写纲要，负责全书的统稿、修订工作，并和几位其它高等院校的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组成编委会。各编委撰写的章、节，按先后顺序排列为：

第一章 第二章 张玉勤

第三章 张玉勤 陈玉林 申国昌 王福应

第四章 王连昌 张玉勤与赵玉钟

第五章 贾白提 王荣林与李长轩

第六章 王小鸽 赵玉钟

在统稿过程中，赵玉钟还补写了一些内容。

另外，山西师大张自诚、山西日报社杨崇仁和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张品兴等同志，对本书的修订和出版都给了热情的帮助。我

们的工作始终是在各参编院校有关领导的支持下进行的。在此一并予以致谢。

编写过程中，我们取材范围很广，参阅了大批文史资料。除各类史书、山西通志、县志外，还有许多今人的著述和资料汇编。如，中国通史、断代史、有关山西的考古报告，《山西文史资料》、《山西大事记》、《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近代的山西》、《山西经济》、《山西四十年》等，恕不一一例举了，仅在此说明，并向有关作者致意。其中，对各家记载不一的数据、时间、地点、史实，为了力求准确，我们都作了查核、辨伪、考证；对一些重要的事件、人物，为了揭示他们的历史作用，我们也进行了评论。尽管如此，由于编写《山西史》是一种新的尝试，缺乏经验，加之我们水平有限，时间仓促，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专家、读者多提批评、修改意见。

承蒙著名史学家赵光贤先生为我们题写书名，特在此表示敬意。

编者

1992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原始社会时期的山西

第一节 旧石器文化遗址.....	(1)
一、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	(1)
二、旧石器中期文化遗址.....	(4)
三、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	(9)
第二节 氏族公社时期的文化与传说.....	(14)
一、山西仰韶文化.....	(14)
二、山西龙山文化.....	(17)
三、“英雄时代”的传说.....	(20)

第二章 奴隶社会时期的山西

第一节 发祥于山西的夏.....	(27)
一、夏的兴起.....	(27)
二、“夏墟”探踪.....	(29)
第二节 商在山西的史迹.....	(30)
一、商的史迹.....	(30)
二、商文化在山西.....	(32)
第三节 西周与山西.....	(34)
一、周族起源于山西.....	(34)
二、封叔虞于唐.....	(35)
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晋国.....	(37)
一、晋国政局的动荡.....	(37)
二、晋文公称霸.....	(38)

三、晋悼公复霸	(40)
四、晋国生产力的发展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发生	(43)
五、晋国的衰亡	(44)
六、晋国境内的民族融合	(46)
七、晋都新田考古	(48)
八、晋国的文化名人	(51)

第三章 封建社会时期的山西

第一节 战国时期	(53)
一、三晋的社会改革	(53)
二、三晋中央集权制政体的形成	(56)
三、三晋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反抗斗争	(58)
四、三晋的对外扩张	(62)
五、三晋的衰落与“长平之战”	(64)
六、三晋的文化与考古	(67)
第二节 秦汉时期	(74)
一、秦在山西的经略	(74)
二、楚汉之争在山西	(76)
三、白登之围与和亲政策	(77)
四、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	(79)
五、东汉时匈奴对山西的侵扰与平息	(81)
六、两汉时期山西的经济	(82)
七、汉末农民起义	(84)
八、两汉时期的历史名人	(85)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	(88)
一、内迁山西的少数民族	(88)
二、刘渊建汉	(89)
三、十六国割据势力在山西	(90)

四、拓跋鲜卑的兴起和北魏的盛衰	(93)
五、东魏、北齐等在山西的统治	(104)
六、驰名的佛教建筑与历史名人	(106)
第四节 隋唐时期	(114)
一、隋末农民起义和刘武周割据	(114)
二、李渊建唐和统一河东	(116)
三、千古女帝武则天	(119)
四、隋唐与突厥在山西的战争	(121)
五、安史之乱时的山西	(124)
六、李克用割据山西	(126)
七、唐朝时山西经济的大发展	(130)
八、太原古城的黄金时代	(133)
九、灿若群星的历史名人	(134)
十、璀璨的艺术和宏伟的建筑	(147)
第五节 五代十国辽宋金元时期	(150)
一、五代十国时期的“河东道”	(150)
二、北宋统一河东	(153)
三、杨业父子抗辽	(156)
四、风起云涌的抗金斗争	(160)
五、元朝统治的确立及红巾军在山西的胜利	(162)
六、辽宋金元时期的山西经济和民族融合	(165)
七、五代十国辽宋金元时期的文化	(169)
第六节 明清时期	(184)
一、明在山西的统治和洪洞大槐树下移民	(184)
二、明代山西大同的马市和私市	(186)
三、走西口与开发丰州川	(190)
四、明末农民起义在山西和山西的抗清斗争	(193)
五、山西的资本主义萌芽	(199)

六、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	(205)
七、明清文化和艺术	(210)

第四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山西（上）

第一节 鸦片战争时期的山西	(221)
一、鸦片战争前的山西社会	(221)
二、鸦片战争和山西	(225)
第二节 北伐太平军和西捻军在山西的战斗	(227)
一、北伐太平军在山西的战斗	(227)
二、西捻军在山西的战斗	(231)
三、朔州熊六农民起义	(233)
第三节 山西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	(234)
一、帝国主义对山西的侵略	(234)
二、山西义和团的反帝斗争	(235)
三、清政府对山西义和团的血腥镇压	(238)
四、山西人民的灾难	(240)
第四节 农村经济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242)
一、外国资本主义对山西农村的疯狂掠夺	(242)
二、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因素发生	(244)
三、赋税制度、租佃关系和地租形态的变化发展	(247)
第五节 近代工业的出现和新的阶级的产生	(249)
一、近代工业的初创时期	(249)
二、新的阶级的产生	(255)
第六节 辛亥革命在山西	(257)
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觉醒	(257)
二、同盟会山西分会的成立与革命活动	(259)
三、太原起义和山西军政府的成立	(267)
四、忻代宁公团和大同起义	(270)

五、燕晋联军的失败	(273)
六、平阳府得而复失和河东军政分府的建立	(276)
七、袁世凯扼杀山西革命的罪行	(279)
第七节 阎锡山独裁统治的确立	(281)
一、效忠袁世凯，扩张权势	(282)
二、依附段祺瑞，确立独裁统治	(289)
第八节 近代山西的教育和文化	(296)
一、近代山西的教育	(296)
二、近代山西的文化	(308)

第五章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山西（下）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315)
一、“五四”爱国运动在山西	(315)
二、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传播和社(青)团的活动	(317)
三、山西共产党组织的建立	(323)
四、党组织领导下山西群众运动的发展	(326)
五、山西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	(332)
第二节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335)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山西形势	(335)
二、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	(337)
三、山西反动派压抑抗日救亡运动	(343)
四、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建立	(346)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	(360)
一、抗战初期的山西	(360)
二、山西军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斗争	(371)
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384)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	(385)

一、上党战役	(385)
二、阎锡山的暴政	(387)
三、山西各解放区的扩大和土地改革	(393)
四、山西的解放	(397)
第五节 现代山西的文化	(403)
一、教育	(403)
二、文艺	(404)

第六章 社会主义时期的山西

第一节 坎坷的历程	(407)
一、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	(407)
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开始时期	(410)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	(414)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418)
第二节 经济的振兴	(422)
一、工业	(422)
二、农业	(428)
三、商业与旅游业	(430)
第三节 教育、科技、文化的繁荣	(433)
一、教育	(433)
二、科技	(435)
三、文化	(437)
第四节 体育、卫生和人民生活	(441)
一、体育	(441)
二、卫生	(442)
三、人民生活	(443)
第五节 山西历史名产	(443)
附：大事年表	(451)

第一章 原始社会时期的山西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的东部，因在太行山之西而得名。境内山河纵横。山，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北有管涔、南有中条，山峦起伏，构成许多丘陵和高地。河，黄河沿西折向东去，境内又有汾、浍、涑、沁、漳、滹沱、桑干等大小河流，造就了大同、定襄、太原、临汾、运城、上党等许多河谷盆地或平原。中外考古学家认为，丘陵和山前、河谷台地，往往是人类和文化起源的理想地域。山西这样的自然环境，自然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无论是原始人群，还是氏族公社，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址和优美的历史传说。山西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第一节 旧石器文化遗址

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长达二、三百万年，分为猿人、古人、新人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的旧石器早期、中期、晚期文化遗址，在山西均有发现，多达200余处，占到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其数量之多、内涵之丰富、发展序列之清楚、年代之衔接、类型之多样，均为国内其它地区所少见。它反映了早期人类在山西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延续性发展的情形，为我们研究旧石器时代各方面的课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一、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址

计有芮城西侯渡、匼河，垣曲南海峪，襄汾解村，万荣西桌子村等多处。这些遗址出土的旧石器，大多以大型三棱尖状器和石片石器为主。尤以西侯渡和匼河遗址为重要。

西侯渡遗址 1961到1962年间，发现于芮城县西侯渡村。经测定，距今180万年，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猿人活动遗址。这里出土内容丰富，有32件人工痕迹清楚的石制品和带切痕的鹿角与烧骨，还有大批古脊椎动物的化石。

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从这些石制品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制造石器都是依据一定方法进行的。有用石锤从石核上直接打击石片的锤击法，有用手握石核在石砧上碰击石片的碰击法，有用石锤砸击石砧上的石核产生石片的砸击法。然后，再把这些石片加工成适用于刮、削、砍斫的石器。值得注意的是，石片的第二步加工，并不是在薄弱的地方，而是在石片的最厚处。这种现象说明，当时人类制作石器不仅目的明确，而且有了一定的技术水平。西侯渡出土的一件三棱尖状器，原为一个呈三面、三缘的尖形砾石，加工后的尖端相当对称、突出，亦为三棱形，显然使用部分在尖端。这种三棱大尖状器，是我国石器时代的一种传统性工具。在陕西蓝田，山西匼河、丁村也都发现过。此为最早的一件。

带有切痕的鹿角，切痕沟槽的横断面呈“V”形，可以肯定并非由于腐蚀或其它的自然力所形成，而是人工用锐利的器物切割或砍砸出来的，因为沟槽的斜坡上至今仍能明显地看出有三层切割或砍斫的痕迹。据推测，这是当时人类制作角器时留下来的。

烧骨，是一些颜色呈黑、灰和灰绿色的化石，大部分为哺乳动物的肋骨、鹿角和马牙。经化验，是被火烧过的，这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烧骨。它们存留在当时人类活动过的遗址里，说明早在180万年以前，生活在西侯渡一带的人类，除过采集和使用简单的石器狩猎外，已经懂得使用火了。火可以熟食，使人类脱离了“茹毛饮血”的时代，扩大了食物的来源，大大缩短了人们的消化过程，增强了人类体质和头脑的发展；火可以照明取暖，

加强了防御寒冷的能力，扩大了生活领域；火可以围攻野兽，为人类提供了一件威力无比的狩猎武器。总之，火的使用大大增长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纪元。西侯渡烧骨的发现，把人类使用火的历史提前了一百多万年。

古脊椎动物的化石，是一些现今已经绝种了的巨河狸属、剑齿象属、双叉鹿属、山西披毛犀、古板齿犀、中国长鼻三趾马、三门马等，根据这些化石，不仅可以确定遗址的地质年代为早更新世，而且还可以知道当时的气候四季分明，夏季绿草如茵，冬季草木枯萎，因为三门马、披毛犀和板齿犀等都是适合吃干草的动物。

西侯渡遗址的发现意义重大。尽管在这里没有发现人类的遗骨，还需要继续发掘，但就出土的如上遗物，已把人类的历史提前了100多万年。它证明山西是早期人类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从而为我们研究旧石器的早期文化和人类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匼河遗址 发现于芮城县风陵渡匼河村一带。在这里沿黄河东岸南北长13.5公里的距离内，经1957年，1959年调查，有11处旧石器遗址。石制品都位于红色土下的砂砾层和泥灰层中，共存有13种典型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如披毛犀、膻骨鹿，扁角鹿和东方剑齿象等。经测定，距今六、七十万年。

匼河遗址出土的石制品，都是采用直接打击法制成的。石器有加工过的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石球等。特点是以石片石器为主。如，具有第二步加工的刮削器，均由较小的石片制成，被修整成的刃口缘，亦有明显的剥落碎屑的使用痕迹。砍斫器的制作较复杂，有不少是石片加工成的。有一面加工的，也有两面加工的。其中有些石片在刃口用钝之后，又作过多次修理，打出新的刃口再继续使用。由于反复使用和反复加工，出现了层层迭迭的石片疤。一件三棱大尖状器，是由原石

片制成的，三个边棱上有交互打击的痕迹，从其巨厚的程度和打制的方法看，与丁村遗址中的三棱大尖状器非常相象。另一件小尖状器，也是用厚石片加工修制而成的，加工的方法，由两侧缘趋向于尖端，显然它的使用部分在尖端。用这样的方法打制的小尖状器，在周口店中国猿人化石的产地发现过，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山西丁村、宁夏水洞沟，陕北莎拉乌苏河发现过，近年来，在山西垣曲的红色土中和朔县黄土底部砾石层中，以及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梵王寺等地也发现过。这一石器的普遍存在，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人类在不同地区内，其生活有着一定的共同性。石球共有三件，原料为黑色石英岩，轮廓呈多面体的球状，表面打击的石片疤碎小而零乱，有的是两头对击的，有的是与对击的石片疤又交叉打击的。这样纵横打制，使它成为球状，具有早期石球的一般特征，与丁村发现的石球性质相同，都是作为投掷武器打猎用的。

石片石器是我国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所共有的特点。匼河石器与同类型的中国猿人石器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性，以不同性为主，在打制技术上比中国猿人的原始。与丁村古人石器相比，虽然在打制技术上比丁村古人的更原始，但在打制方法上却相当一致，尤其从两地共见的三棱大尖状器和石球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因此，一般考古学家认为，丁村文化是由匼河文化逐渐发展而来的。在匼河文化发展阶段，人们使用着比中国猿人还落后的原始石器，过着既采集又狩猎的经济生活，虽然非常艰辛，经常挨饿，但他们还是在劳动中逐步前进，终于进入了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阶段。

二、旧石器中期文化遗址

旧石器中期文化，在山西发现较多，分布的地区亦广。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襄汾丁村、阳高许家窑、大同青磁窑、霍县赤寺等多处。尤其以丁村遗址和许家窑遗址为最典型。他们分别反映了一、二十万年以前，古人在山西的生活情况。

丁村人遗址 因发现于山西襄汾县丁村一带而得名。

1953年，当地群众在丁村附近的汾河沿岸挖沙时，发现大量哺乳动物化石。1954年秋，由贾兰坡负责组织了一个考古工作队，以丁村为中心，先后在北起史村、南至柴庄的十几公里地区内，选择了十来个地点进行科学发掘，於高出汾河水面十几米至几十米的砂砾层中，发现了具有共性特征的2000多件打制石器，28种动物化石，特别是在一具犀牛骨架之下约1公尺的砾石层底部，还发现了3枚人牙化石，经测定，距今约10余万年。1976年又在同一地点，发现了同一时期的一个小孩的右顶骨化石和1000件石制品，200多件动物化石。由于丁村一带发现的人类化石和石器，是旧石器中期古人生活遗址的典型代表，对我们认识汾河流域的古代社会和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秋，山西省文管会树立了保护标志。

丁村发现的3枚人牙化石，2枚门齿有磨耗，1枚下白齿为正从牙槽中长出状，断定是一个十二、三岁小孩的牙齿化石。齿冠、齿根都比北京猿人的细小，牙齿咬合面也较简单，不过比现代人的复杂。门齿舌面保留了北京猿人的形态，呈铲形，这是以后黄种人的体质特征之一。右顶骨壁较薄，显示了他在体质上比北京猿人进步，其后部缺少一角，表示有“顶枕间骨”的存在，这又是黄种人的一个特征。所有这些，都说明他们是介于北京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的黄种人的直接祖先。

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一般器形较粗大，有砍砸器、刮削器、手斧、石球、三棱大尖状器，也有小尖状器，大部分为黑色角页岩，用北京猿人时期少有的交互打击法打制而成。刮削器中的个别石器，有长石片两边都进行了第二步加工的，这种旧石器文化晚期常见的形式，出现在中期级段，说明了它的先进。小尖状器，都是用小而薄长的石片打制而成的，有的刃缘打制得相当平

齐，反映了较高的工艺水平。特别是富有特色的三棱大尖状器，用三棱厚大石片打击而成，加工比较规则，尖端锐利对称，亦为三棱形，其精细程度，较之匼河出土的同类石器，明显进步。石球，是一种有意纵横打击加工而成的球状体，在丁村附近各地点的地层中经常发现，最大的1500克，最小的200克，都比较适用；数量上明显较匼河增多。这是一种打猎用的投掷武器，使用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直接用于投掷猎物；一种是做成“飞石索”，既把石球系在绳索（藤条或皮条）的一端，利用旋转的离心力抛出去套拌猎物。这后一种方法，直到近代我国西南的少数民族还使用过。石球的使用，在旧石器时代具有重大意义，它改变了人类原先只用棍棒追逐猎物的方法，使当时“猎人”们不必与猎物接近，从远距离即可将奔跑的动物猎获，这无疑使人们在狩猎的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加。总之，丁村时代的石器制作较进步，种类较分明，使用上有了一定的分工。还可能出现了一种复合工具——投枪，即用兽筋或藤条把锋利的石器绑在木棍上，投掷出去刺杀野兽的武器。

从丁村发现喜温的象和犀牛骨化石上推知，当时，丁村一带气候温和，汾河水面宽阔，水里有蚌和各种鱼类，其中最大有1米多长。附近有大面积的草原，山上有茂密的森林，生活着成群的鹿类、野马、野驴、羚羊、象、犀牛、熊、狼等。

丁村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从事着采集和渔猎的艰苦生活。他们改进了工具，用三棱大尖状器挖掘植物的根块，用飞石索，投枪狩猎野兽。随着生产的发展，他们的社会组织也逐步脱离了父母子女之间杂婚的原始群生活，进入了同一氏族内兄弟姐妹为婚的血缘家族阶段，从而为他们向母系氏族过渡准备了条件。

丁村人遗址的发现意义重大。在此之前，我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早期有北京猿人为代表，晚期有山顶洞人为代表，唯独中期是个空白。于是，欧美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乘虚而入，宣

扬“中国人种是由西方来的。”丁村人遗址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我国旧石器中期文化遗址的空白，证明了中国古代文化历史的悠久和连续性的发展，而且具有黄种人特征的牙齿和“顶枕间骨”的存在，说明了他们的土著性质，从而彻底粉碎了“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谬论。同时，丁村遗址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由我国专家与群众相结合发掘的，它表明我们依赖外国人控制的时代已经结束。因此，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重视，到现在，来丁村考察、参观的学者、专家等各界人士以及群众，已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多万人次。西德《明镜》周刊记者邓天诺参观后，挥笔写了“天上有上帝，地下有丁村”10个大字，表示他的崇敬心情。这又说明，它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台湾回归祖国以及对广大群众进行科普教育，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丁村人文化遗址外，丁村还保留着独具特色的明清民居建筑群，1988年亦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一个千口人的小村，同时有两处受到国家级保护，在全国实属罕见。1985年，临汾地区利用丁村民居，又创建了晋南民俗博物馆。丁村古人遗址，民居，民俗，三者相映成辉，使丁村成了中外人士访古忘返的游览胜地。

许家窑人遗址 1976年至1977年，发现于大同盆地东部的阳高县许家窑村附近。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旧石器中期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最丰富、规模又最大的遗址。出土计有人类化石顶骨11块，枕骨2块，附连4颗牙齿的左上颌骨一块，单体牙齿2颗，石器14000余件，还有一批骨、角器和20种脊椎动物化石。经测定，距今约10万年。

人骨化石分属于10多个男女老少不同的个体，平均寿命30岁左右。从化石上看，头骨壁较厚，但颅顶较高，不象北京猿人那样低平；上颌吻部前倾的程度中等，亦没有北京猿人那样突出；枕骨的左侧大脑窝比右侧的大，证明他们生前都是用右手从事劳动

的。这些都说明他们较北京猿人进步。但是，他们的牙齿粗大，牙冠嚼面纹饰复杂，枕骨的大脑窝显著大于小脑窝（现代人多为小脑窝大于大脑窝），这又显示着他们的原始性。根据其体质特征，贾兰坡先生断定“许家窑人”是北京猿人的后代，对研究北京中国猿人的演化，具有重大意义。

在许家窑文化的石器组合中，粗大的石器非常少见，几乎都是打制的细小石器。以石片为例，最小的1克重，绝大部分在30克以下，最大的也只有120克，大多数都有使用的痕迹。这说明到旧石器早期的后一阶段，华北地区确已逐渐形成了打制石器的两大传统：一为匼河——丁村系，即大石片砍斫器和大三棱尖状器传统。这一传统多是用宽大的石片加工制造大型的石器，体大厚重，加工不精细，且类型单调。另一为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即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生产体形细小的石器，类型复杂，加工细致。许家窑文化就属于这一传统。可以说它是北京人文化向峙峪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在许家窑遗址中，石器类型同样细小而复杂，是根据不同用途加工的。如刮削器有直刃、凹刃、凸刃、两侧刃、复刃、龟背状、短身圆头等7种。尖状器也有椭圆形、鼻形、齿形、两头交互加工和圆头刮削器／尖状器等5种。这些小型的刮削器和尖状器，还有小型的雕刻器，重量都很轻，大者7克，小者仅1克，和北京人文化与峙峪文化中常见的类型基本一致。但也有区别，那就是在类型上较北京人文化多了原始棱柱状石核、短身圆头刮削器和圆头刮削器／尖状器等；较峙峪文化又少了楔形小石核、斧形小石刀、石簇等，清楚表明它较北京人文化先进，又较峙峪文化落后，确实介于二者之间。另外，还有一种拇指盖状小刮削器，为我国旧石器晚期的细石器遗址所常见，这又反映了他们和细石器文化的渊源关系。石球之众多，是许家窑文化的特色之一，仅在1976年的发掘中，就出土了1059个。这些石球，最大的1500克以上，最小的不足100克，一